

中国共产党

盖军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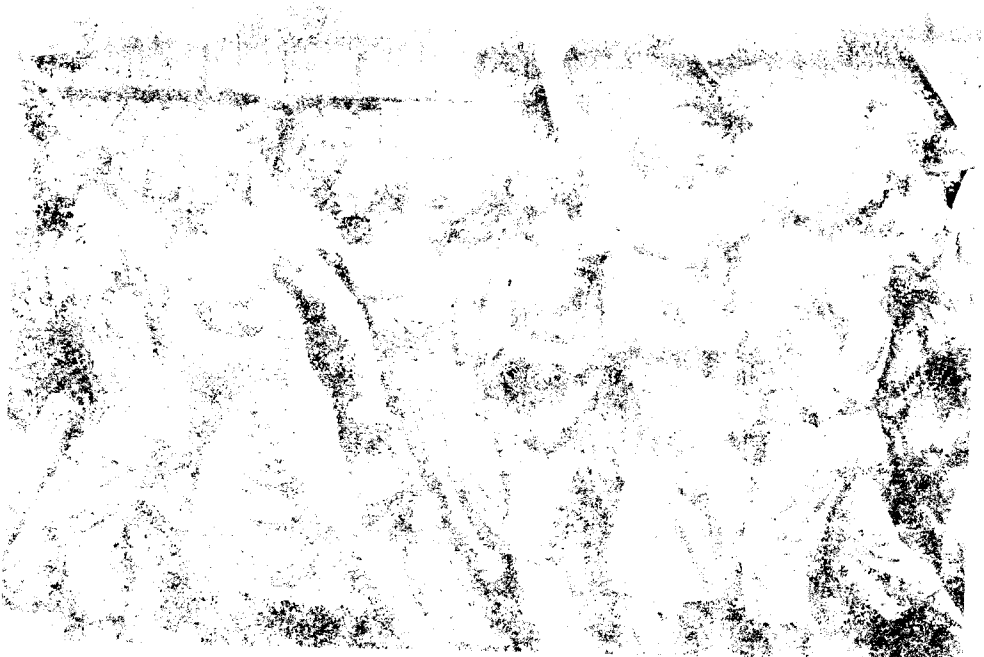
白区斗争史



人民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白区斗争史

盖军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共产党白区斗争史/盖军主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1

ISBN 7-01-002464-2

I. 中...

II. 盖...

III. 中国共产党-党史-国民党统治区-1927~1949

IV. D2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0055 号

中国共产党白区斗争史

ZHONGGUO GONGCHANDANG
BAIQU DOUZHENGSHI

盖 军主编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通县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6 年 1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8.5

字数:400 千字 印数:1—3000 册

ISBN 7-01-002464-2/K·529 定价:25.00 元

绪 言

一

白区工作或白区斗争，在以往的中共党史研究中，主要是指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分裂后，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的秘密斗争。实际上，白区工作不应仅限于秘密工作，也不应仅限于第一次国共分裂后中国共产党的秘密斗争。它应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相对于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一条重要战线，即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其政治代表实行反动统治的区域中，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革命斗争。从广义方面说，“白区”应是北洋军阀统治地区、国民党统治地区，以及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的地区，包括城市和农村。

关于“白区”的提法，最早见于1928年毛泽东给中央的报告。我们这部书使用“白区”一词，以及用它来作为本书的书名，所论述的内容不仅限于十年内战时期，而是作为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专用名词，是泛指反动统治阶级统治的区域。

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反动统治区域称谓，又有不同的提法。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处于北洋军阀的统治时期，

北洋政府残酷地镇压革命党和革命人民，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是非法的、秘密的。当时党中央称在北洋军阀统治地区的活动为“秘密时代”。

1927年春夏之际，蒋介石、汪精卫两个国民党集团相继背叛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建立起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南京国民政府，代替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对共产党和革命人民实行血腥的屠杀政策。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两个被迫：没有合法存在的条件，被迫转入地下，进行秘密斗争；不能坐以待毙，被迫领导人民举行武装起义。在一些地区，起义部队陆续在农村建立局部的革命政权，当时称之为“苏维埃政权”，亦称“红色政权”。它所管辖的地区称“苏维埃区域”，简称“苏区”。1928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首次使用“苏维埃区域”的提法。当时对国民党的国民政府称之为“白色政权”，它所统治的区域称之为非苏维埃区域。1928年11月，毛泽东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即《井冈山的斗争》）中，使用了“红区白区对抗”的提法。从1931年11月开始，中共中央使用“白色统治区域”，简称“白区”。此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就处于白区和苏区的不同环境之下，党的工作也就有了白区工作和苏区工作之分。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蒋介石被迫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这时，中共中央将过去的白区提法改变为国民党统治区（简称“国统区”），将日军占领区称为“沦陷区”。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将当时的中国区分为中国解放区、国民党统治区、中国沦陷区。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撕毁了政治协商会议协议，在美国

支持下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在国民党统治区，中国共产党再一次处于非法地位，转入地下秘密斗争。1947年以后，由于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国民党统治区爱国民主运动的迅速发展，蒋介石政府处于全民包围之中。这时，中共中央文件上对国民党统治区称为“蒋管区”。

上述各个时期的提法虽有不同，但其实质是一样的，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均是处于非法、半合法的境域。

不言而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武装斗争，即经过长期的艰苦的武装斗争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形成对城市的包围、最后夺取中心城市而取得全国胜利的。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则是从星星之火逐步发展成为燎原之势的。在农村革命根据地之外，存在着广大的白区，尤其是反动统治阶级长期占据着政治、经济中心的城市。没有党在白区工作的配合，武装斗争不可能取得胜利。毛泽东曾经说过：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的斗争形式。“但是着重武装斗争，不是说可以放弃其他形式的斗争；相反，没有武装斗争以外的各种形式的斗争相配合，武装斗争就不可能取得胜利。着重农村革命根据地上的工作，不是说可以放弃城市工作和尚在敌人统治下的其他广大农村中的工作；相反，没有城市工作和其他农村工作，农村根据地就处于孤立，革命就会失败。而且革命的最后目的，是夺取作为敌人主要根据地的城市，没有充分的城市工作，就不能达此目的”。^①毛泽东关于革命根据地以外斗争的重要性的论述，说明了白区工作是中国革命斗争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有两个方面：农村根据地斗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36页。

争是一个方面军，白区斗争是一个方面军。没有两个方面军的相互配合，相互支援，中国革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

白区工作的内容是很广泛的，包括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统一战线、军事工作，以及秘密党的组织建设、党的活动方式和斗争策略，等等。总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全局，中国共产党领导白区工作的重点还是在城市工作方面。因此，本书也就着重于城市斗争的记述，适当地兼顾其他。

二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的城市工作，第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正确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第二个重要的问题，是根据形势的变化，如何正确地制定白区斗争的策略方针问题。这里就这两个问题概述如下：

1939年，毛泽东在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时曾指出，当我们党能够正确处理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的关系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就会前进一步，而如果不能正确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时，我们党的发展和巩固就会要后退一步。当时毛泽东是总结了党成立后18年的历史经验，实际上，这一条基本经验贯穿着整个民主革命的28年。

28年中，在处理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和关于白区的策略方针方面，中国共产党大体上经历了两个历史阶段，即从幼年到成熟的阶段。

第一阶段：从1921至1935年。中共中央的各届负责人作为领导集体来说都处于幼年时期，不真正懂得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

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基本上听命于共产国际。

党的“一大”制定的党纲,提出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以实现社会主义为直接奋斗的目标,说明建党之初党还不真正了解中国的实际,不了解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尤其是资产阶级的状况。当时的思想只能反映出一种急于拯救中国,相信只有实行社会主义才有出路的主观愿望。党的“二大”提出了建立“真正民主共和国”的思想,承认资产阶级在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中具有革命作用。正是中共领导人当时对中国资产阶级有了较为正确的认识,才实现了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

在酝酿国共合作的过程中,中共中央一些领导人也开始尝试对资产阶级进行具体分析。例如,陈独秀曾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大体上可分为三部分,即:反革命的资产阶级、非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的资产阶级。不久,他也赞同瞿秋白的观点,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即有革命可能的,包括革命的“工商阶级”及小资产阶级(手工业家及小商人);没有革命可能的,即反革命的官僚资产阶级。陈独秀当时的基本思想是从中国经济发展的程度,不可能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他认为,只有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建立,才能为无产阶级进行第二次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奠定必要的物质基础和政治前提。这种观点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顺应了社会经济发展客观要求。但是,陈独秀没有从当时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阶级状况,以及共产党人的理想目标方面考虑,从而割裂了两个革命阶段之间的联系。

国共合作实现以后,在统一战线内部,由于两党的信仰、宗旨不同,在深入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必然出现分歧、矛盾和斗争。处于幼年阶段的中国共产党,虽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发

生过怀疑,但由于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认识不足,对同盟者的背叛缺乏警惕,不会运用正确的斗争策略,尤其不懂得同资产阶级争夺对革命的领导权,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机械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旨意,以及在工农群众运动中出现某些过火斗争的现象,因而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中国共产党遭受了惨重的失败。

1927年2月,中共中央接到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决议案提出争取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争取建立一个排除资产阶级,而由工农小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民主国家。中央政治局随即召开会议讨论贯彻。5月,召开了“五大”。两会完全接受了共产国际这一决议案,提出建立工农小资产阶级国家的设想。这一设想有其正确的一面,但也并不适合中国国情。资产阶级某些代表人物暂时离开革命,不能否定整个资产阶级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主张把整个资产阶级排除在革命阵营和国家政权之外,这就开始了“左”的错误。

大革命后期,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是主要的,同时,在工农运动中也出现了“左”的错误。这种“左”倾错误在城市工人运动中的表现是“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作时间至每日四小时以下,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搜查轮船火车,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分配工厂店铺,”^①等等。因而在广州、长沙、武汉等城市出现了企业倒闭,资本家关门与逃跑,物价高涨,货物缺乏,市民怨恨等等严重情况,对革命事业的发展极为不利。对于上述“左”倾错误,应当如何认

^① 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引自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刘少奇论工人运动》第213页。

识,刘少奇在1937年写给张闻天的信中,正确地指出:当时“整个国民革命的利益高过工人经济上的利益,工人不能为部分的暂时的利益,妨害长久的整个阶级的利益。经济要求应有最高限度,使企业不致倒闭。工人的行动要顾及联合战线,不要与当时国民革命的利益矛盾”^①。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客观上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联合力量强大。在主观方面,有共产国际的指导错误,有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而在工农运动中的“左”倾错误也是不能回避的原因之一。

1927年的“八七”会议有伟大的历史功绩,但在同时又发展了上述“左”倾错误,认为整个资产阶级背叛了革命。第一次“左”倾盲动主义统治中央时,提出“中国革命要推翻豪绅地主阶级,便不能不同时推翻资产阶级”,以“急转直下”地“进于社会主义的革命”。正是在这种“左”倾思想指导下,上海等地发生了强迫工人罢工的盲动主义,给工人运动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党的“六大”正确地指出中国革命的性质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对革命的形势、任务作了基本正确的规定,因而“六大”以后党在城市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六大”并未从根本指导思想上纠正对资产阶级的错误观点,把民族资产阶级当成“阻碍革命胜利的最危险的敌人之一”。在这一错误思想指导下,“六大”通过的《职工运动决议案》,规定“此时不宜提出‘统一战线’的口号”,实际上是反对同有群众基础的上海七大工会等类的工会建立统一战线,对可以争取、可以中立的一些代表人物,一概采取打倒的方针;不顾当时形势,拒绝利用合法,提出建立赤色工会

^① 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引自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刘少奇论工人运动》第217页。

和工厂委员会的口号，这就丧失了广泛联系群众的阵地，把自己局限于极少数人参加的赤色工会的狭小的圈子里，使工人运动无法打开局面，也就不能积蓄力量。同时，中央把上层小资产阶级也排除在革命动力之外，否认学生是工农革命的同盟军，强调妇女工作的重点是女工和农妇，因而“六大”以后学生运动和妇女运动也无重要成绩可言。

“六大”由于对革命的长期性认识不足，在白区没有长期的秘密工作的准备，也就没有着重提出使党转变为秘密党。因而其后八九年的时间里，在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联系的问题上，犯了许多错误，使党在白区的组织和工作遭到严重损失。

在“六大”对资产阶级的“左”倾思想指导下，1930年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中央时，继续提出“没收中国资产阶级的工厂、企业、银行，以消除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武器”、“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资本家”等口号，准备在上海发动第四次武装暴动，“消灭统治阶级、建立全中国苏维埃政权”。“左”倾冒险主义贯彻的结果，使刚刚得到恢复和发展的城市工人运动，又遭到严重打击。同年9月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作为立三路线主要特征的那些错误。但是，“八七”会议以来对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左”倾思想的实质，没有加以清算和纠正。王明上台以后，完全照搬共产国际的决议，比立三的“左”倾显得更有“理论”。提出“现阶段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在坚决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得到彻底的胜利”，因而在反帝反封建的同时也要“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不仅把民族资产阶级划到敌人一边，对上层小资产阶级也不要团结，提出建立下层统一战线的关门主义的策略。对那些为保障工人自身利益、防止资本家压迫，但不反对国民党而自发组织起来的工会；对依据国民党公布

的《工会法》而成立的合法工会，统统称之为“黄色工会”。对“黄色工会”及其领袖同国民党官办的工会不加区别，一概加以反对，提出打倒黄色工会、打倒黄色领袖的口号。在职工队伍中，对职员也是要反对的，认为他们是上层小资产阶级。在青年学生运动中，把广大青年学生划到上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一边，认为只有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才是革命的，领导斗争只开展工农青年群众的工作。在妇女工作中，把知识分子的妇女划到团结、争取的范围之外，坚持只开展女工、农妇的工作。在文化运动方面，否认存在“第三种人”和“第三种文学”，认为文学不是无产阶级的，就是资产阶级的；只有无产阶级文学才是革命的。在国民党军队工作中，只要兵，不要官，认为军官都是反动的、或妥协的，只有士兵才是革命的。正像毛泽东所形容的：“如果同蔡廷锴握手的话，那必须在握手的瞬间骂他一句反革命”。在阶级关系上实行关门主义，在斗争策略上拒绝利用合法，不懂得积蓄力量。这样，王明“左”倾关门主义贯彻的结果，中国共产党自己孤立了自己，白区革命力量日益缩小。中共中央在白区已不能立足，1933年初不得不迁到江西农村革命根据地。留在上海负责领导白区工作的中央局仍然继续执行“左”倾关门主义、冒险主义的策略，使中国共产党在白区的组织几乎是丧失了百分之百。

在严酷的事实面前，临时中央有的领导人，如张闻天、陈云等，注意总结经验教训，开始批评、纠正白区工作中某些“左”倾错误，王明、康生也从莫斯科来信，提出注意改变斗争策略。然而，“左”倾错误的根本指导思想并没有解决，因而有些批评也就无济于事，或者是亡羊补牢，为时晚矣。

· 第二个阶段：从1935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摆脱了幼年时期，逐步走向了成熟。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客观和主观条件不允许详细讨论白区工作，但中央至少已认识到“对白区群众斗争的领导方式，必须有彻底的转变”。这是中央关于白区工作转变的开始。

1935年12月，鉴于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决定、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以及对革命遭受失败的反思，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会议决议，特别是毛泽东在会后活动分子会上的讲话明确地指出，不能把民族资产阶级同地主阶级、买办阶级看成是“同一的东西，他们之间是有分别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地主阶级那样多的封建性，没有买办阶级那样多的买办性”，在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新环境下，中国共产党应该纠正以往的错误，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此，会议决定把工农苏维埃共和国改变为人民共和国。决议提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用比过去宽大的政策，对待民族工商业资本家”，“以发展中国的经济”。同月初，在张闻天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从发展生产力的高度指出，目前资本主义的发展“对我们不是可怕的，而是有利的”。关于白区斗争的策略，第一次提出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思想，这是白区工作方针的一个重要转变。瓦窑堡会议标志中国共产党总结了建党14年以来“左”的和右的错误的经验教训，注意从中国国情的实际出发制定党的路线和政策，开始成熟起来。

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为加强白区工作选派富有白区工作经验的刘少奇担任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在北方局工作近两年的时间里，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建党14年来白区工作的经验教训，结合华北白区党的工作，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阐述了白区工作正确的方针、政策。正如1945年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若干

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指出的，刘少奇在白区工作中的策略思想是一个模范，是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

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中国共产党有了合法半合法的地位，为恢复在各城市的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中共中央根据新的形势，提出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要充分利用合法半合法的地位，广泛地宣传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而谨慎地发展党的组织，发动与组织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支援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在沦陷区，必须贯彻保存力量、积蓄力量、隐蔽力量的方针，为将来反攻和收复城市作好准备。上述正确方针的贯彻，使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和组织力量不断扩大。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本的诱降和国民党领导集团畏惧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的发展壮大，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限共”、“防共”、“反共”的方针，会后又先后秘密颁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一系列反动文件，囚禁和杀害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从1939年冬到1941年春，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日益猖狂，制造一系列镇压抗日力量的事件，如晋西事变、皖南事变等。形势的急剧变化，要求中国共产党在白区的组织形式、工作方式必须有所改变。中共中央规定白区“以整理紧缩严密和巩固党的组织工作为今后一定时期的中心工作”，特别强调要“注意掩蔽力量”、“保存干部”，地下党的指导机关“力求短小精干”，准备“长期埋头苦干，积蓄力量”。实践经验的积累，使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对白区工作的规律性认识。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论政策》指示中指出：“在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政策，是一方面尽量地发展统一战线的工作，一方面采取荫蔽精干的政策；是在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

上采取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①对白区工作方针作了完整的概括。（建国后，在出版《毛泽东选集》时，把荫蔽精干的思想补充到这个方针的文字表述中去，从而成为“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

国民党领导集团加紧反共的活动，促使中共中央对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放弃了同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共同建立三民主义共和国的设想。1939年底至1940年上半年，毛泽东根据当时蒋介石国民党的对内对外政策以及各抗日党派的情况，进一步分析了中国的资产阶级，强调指出资产阶级有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别，买办资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对象。但是，因为买办资产阶级是分属于各个帝国主义的，在革命主要是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时候，属于别的帝国主义系统之下的买办阶级也可能在一定的程度上和一定的时间内参加当前的反帝统一战线。

毛泽东着重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他指出，民族资产阶级中又有大资产阶级与中产阶级的区别。大资产阶级是妥协性很大、很不可靠的部分，而中产阶级尤其是中等民族工业资本家是带有比较多的革命性的部分。1940年3月，毛泽东把与蒋介石态度不同的地方实力派和其他中等资产阶级分子明确界定为中间势力，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同年9月，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饶漱石，要求南方局和东南局对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大地主和开明绅士以及国民党军官进行分省调查。目的将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大地主与开明绅士加以区别。毛泽东指出，大资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763页。

产阶级是带买办性的，与外国资本有联系，是现时的主要当权者，而民族资产阶级是受大资产阶级统治，与外国资本家联系少，现时基本上没有政权，即中等资产阶级。这就把少数当权的大资产阶级与不当权的中产阶级区别开来。这以后，毛泽东继续研究资产阶级问题，强调要对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同年12月，毛泽东又进一步指出：“对于反对抗日的亲日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主张抗日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又须对于主张抗日但又动摇、主张团结但又反共的两面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两面性较少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小地主、开明绅士，加以区别。在这些区别上建立我们的政策。”^① 这些重要区别成为中国共产党团结民族资产阶级的大多数，孤立和打击少数当权的大资产阶级斗争策略的理论基础。完全从中国经济、政治和阶级关系的实际出发制定党的政策，说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摆脱了一种固定的理论观念和经验模式，更加成熟了。

依据上述正确的理论、政策为指导，党在国统区的党组织南方局在周恩来的杰出领导下，进一步加强了对中间势力的争取工作，为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孤立和打击了国民党的少数顽固势力。在国统区一些具体工作的策略方面又有丰富和发展，如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三化（职业化、社会化、群众化）等等为坚持国共合作和全民族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5年4月20日，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系统地总结了白区工作的经验教训，指出“以防御为主（不是以进攻为主），尽量利用合法的机会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764页。

去工作(而不是拒绝利用合法),以便使党的组织深入群众,长期荫蔽,积蓄力量,并随时输送自己的力量到乡村去发展乡村武装斗争的力量,借此以配合乡村斗争,推进革命形势,为其主要方针。”决议明确规定了白区工作的历史地位和基本的斗争方式,即以防御为主,积蓄力量,配合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从内容和文字上全面、准确地概括了白区工作的方针。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成为蒋介石集团反动统治的经济基础。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指出:“这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但压迫工人农民,而且压迫城市小资产阶级,损害中等资产阶级。这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日本投降以后,达到了最高峰,它替新民主主义革命准备了充分的物质条件。这个资本,在中国的通俗名称,叫做官僚资本。这个资产阶级,叫做官僚资产阶级,即是中国的大资产阶级”,“被这些阶级及其国家政权所压迫和损害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虽然也是资产阶级,却是可以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或者保守中立的。他们和帝国主义没有联系,或者联系较少,他们是真正的民族资产阶级。”^① 官僚资产阶级新概念的提出,更加科学地概括了作为革命对象的那部分资产阶级的特点,使资产阶级的两部分的区别更加准确。1948年4月,毛泽东科学地完整地概括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指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毛泽东还明确指出,人民大众“包括了工人、农民、独立劳动

^①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53—1254页。